

陈志锐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群众大会上，黄循财总理似乎刻意放慢语速，说出一句道地的潮州话：“做人要有情有义”。紧接着全场爆发掌声。掌声中，我联想到的不仅是出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头的感人情谊，其实更深刻，也更撞击我内心的是——我们华人对自己的方言，也要“有情有义”。方言，除了是地方的语言，更是贴近内心的语言，当是值得引用、值得珍惜，且不须要被“矫正”的对象。很奇妙的，若这句“做人要有情有义”是总理用华语说出来，会不会有同样的分量和震撼呢？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方言之所以打动人，正是因为它承载华语、英语，甚至其他母语所无法完全翻译的语气、情感与情绪。总理自己也承认，这句台词“用方言说出来感觉就是不一样，比较亲切”。这四个字——“比较亲切”——道出整个政策转向的情感核心。是的，即便推动讲华语运动这么多年，方言仍然有无比亲切的，无法被取代的意义与地位。

严格来说，这次国庆群众大会宣布的新语言政策并不算翻天覆地：电影方面，只要片商在上映全方言或以方言为主的电影时，同时提供华文字幕和华语配音版本，戏院放映场次的限制就取消；在付费电视方面，“每周仅限播一部方言艺术片”“音乐频道方言歌曲占比”这类沿用多年的旧规也将走入历史，方言内容的限制全面取消。至于免费无线电视和广播电台，则继续以华语为主，方针几乎原封不动。

换句话说，政府松开的是娱乐消费端的一道闸门，而不是语言生态本身的水源。这是一次精确计算过的松绑——让出已经被市场证明有需求、有商业价值，又不至于真正撼动华语主导地位的领域。我们几乎可以想象政策制定者一边估算《给阿嬷的情书》在本地引起的话题热度和票房效应（是的，感谢阿嬷，也感谢坚持看原汁原味潮语版的新加坡观众），一边小心翼翼地“双语政策”与“方言文化”之间画出一条极细的线。

“有情有义”的，是人，也是语言

我们是否也可以期待有关当局逐渐为方言腾出更多制度性的空间与资源，慢慢地使得“华语可以，方言也可以”？是的，只要我们这世代的个人与家庭还愿意持续投入耐心与诚意，方言就不会只活在电影的两个小时里。

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从来不是浪漫的产物，而是政治精算的结果。但正因如此，当总理说“很多人认为方言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珍惜和传承，我也同意”，我内心再次被两个字撞击了一下。“遗产”——这两个字若用得越顺口，其实暗藏的意识危机就越大。我们都知道所谓“遗产”是留给后人凭吊的、是摆进博物馆玻璃柜的、是贴上说明供人瞻仰却不再使用的。如果方言只是“遗产”，今天语言政策的松绑，就少了现实和日常的实质意义。借用总理谈新谣的时候，引用梁文福博士所说的关键概念：新谣是文化资产，不是遗产；同样的，我更愿意，也更坚持，把方言称为华族文化的“资产”，而不是遗产。“资产”强调方言至今仍是活的、有价值的文化财富，值得善加利用和发展。资产是要拿出来用的，是能生息、能增值、能在下一代手里继续流传的东西。遗产等着被继承，资产却须要被经营。这一字之差，决定了我们是要把方言当作博物馆里的喇叭播放出来的陌生音声，还是要当作一门活着的、能说能笑、还能骂人、还能谈恋爱的语言来使用。这个选择，我想毋庸置疑。

方言可否寓教于乐自然习得？

当然，接下来该质问的是，到底还有多少国人能够把方言当一门活的语言来用？从全国语言普查结果，我们当然看到只剩个位数百分比的家庭还常用方言，但是此时我又想借用总理演讲词里头那个关于《海峡时报》记者的生动故事：她天天让孩子听周杰伦、追看付费电视热播剧《逐玉》，三个月后，自己的华语更流利了，两个孩子对华文也更有兴趣了。这个例子被总理拿来当作“寓教于乐”的华文学习成功案例。那同样的，方言的学习是否也有可能，在方言政策松绑后，通过类似寓教于乐的方式自然习得？

我以为绝对可能。同时我更以为，放宽方言电影和付费电视的管制，不会冲击华文、华语的学习。反之，这除了肯定对方言及文化的传承有积极正面的促进作用，甚至还会间接促进年轻国人对本族文化的兴趣，然后再进一步加强华文的学习与使用。毕竟，方言与华语在口头读音上虽不完全互通，但两者在根源上属于同源同文，彼此共享汉字这套书写系统和深厚的文化逻辑，可谓相辅相成。同时，让年轻一代有机会重新接触潮州话、福建话、广东话等祖辈的语言，还可以弥补与家里长辈语言代际断层的问题。届时，或许好多祖父母毋须再被迫以蹩脚的英语和孙子孙女沟通，反而是倒过来孙子孙女希望向祖父母学习越来越“潮”的家族方言。

呵，多么美丽的想望——但很多时候，通过方言去认识华族的传统和本土文化，确实更有亲切感。方言承载着许多华语无法完全传达的语言、籍贯，甚至文化细节——个人祖籍地的特殊俗语、传统节庆的习俗与事物的称谓、家族亲戚与长幼族人的称呼、市井小民的智慧说法等等。当这些内容用方言呈现在电影和付费电视里，观众（尤其是年长一辈或曾使用方言的家庭），会产生一种情感甚至血脉上的共鸣和亲近感。这种亲切感也有助于年轻一代，更立体地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根源，而不只是表面停留在书本或课堂知识的层面。

华语和方言可以并行不悖——华语教育政策的大方向不变，但适度放宽方言电影和付费电视管制，既能保护和激活方言这份文化资产，完全不必担心它“卷土重来”抢走华语的地盘，同时也能为本地电影和电视业注入新活水，打入一剂众望所归的强心针。过去，本地导演若想拍一部以本地方言，如福建话、潮州话或粤语为主要对白的电影，戏院放映场次的种种限制，等于先天判了它票房上的死刑——观众想看，院线却无法排片。如今限制解除，创作者终于可以按照角色与场景的真实需要

来选择语言，而不必为了迁就政策而削足适履地把市井小贩、菜市场阿姨、组屋楼下的老伯统统改口说标准华语了。当然，外来进口的方言电影和收费电视节目，得以展现“原始语言”和“本来面目”，自然更是观众的福音。毕竟，方言所携带的，是华语难以复刻的生活质感：一句脱口而出的粗口里的幽默感、一声长辈呼唤晚辈时特有的腔调、一个只有本地人才会心一笑的市井俚语。这些细节堆叠起来，才构成新加坡故事真正的“在地性”。当创作自由被归还给创作者，本地华语电影才有机会摆脱长期以来在中港台影视工业阴影下的模仿姿态，找到真正属于自己，别处无法复制的声音与色彩。这是文化产业松绑最值得期待的红利，也是这次政策调整中，我认为最应该被大声叫好的部分。

最后，我想回到那句“做人要有情有义”，我们对自己的方言，也要有情有义。方言的“亲切感”，是任何标准化、规范化的华语教育都难以复制的珍贵资产。但亲切感终究只是起点，不是终点。一部电影能唤起的乡愁，却撑不起一整代人的语言传承；一场国庆演说里的动人引用，也代替不了长期、系统、有资源投入的文化耕耘。如果有关当局真心认同方言是值得珍惜与传承的资产，松绑电影与付费电视的播映限制，应该只是一个冒号，不是句点。方言新闻的播报时段与长度的增加、方言口述历史的抢救与数码化保存、社区方言活动与代际对话空间的营造、学校里以文化认识（而非语言能力考核）为目的的方言接触课程、鼓励本地创作者以方言讲述新加坡故事的资助机制——这些才是真正能让方言从“值得怀念的遗产”，转化为“持续生息的资产”的硬功夫。

总理在华文演说尾声提到多讲华语，“我可以，大家也可以”，再一次把语言使用的责任交回到个人与家庭的手上。我们是否也可以期待有关当局逐渐为方言腾出更多制度性的空间与资源，慢慢地使得“华语可以，方言也可以”？是的，只要我们这世代的个人与家庭还愿意持续投入耐心与诚意，方言就不会只活在电影的两个小时里。

作者从事语文教育和本地文化研究